

我国法律题材电影对法律精神的弘扬

■文/魏晓楠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的这场文艺界盛会,其意义不言而喻。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及时抓住把握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革,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从19世纪末电影发明以来,影像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影工业的完善,能够成批量生产出一系列的电影,中国作为世界电影工业的一部分,同样也丰富了电影的多样性。许多优秀的电影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一代人的观点,乃至推动社会的变革,如今还在被人们反复观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反作用,为建设法治中国,如何发挥文艺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回顾法治的发展,不能忽视文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另辟蹊径,可以从和法律题材有关的电影去看待它们是如何体现法治,又如何向观众普及法律。

我们去回顾法律题材有关的电影,它们所体现出来法律精神,是与时代紧密连接,这个过程也正是我们推动法治发展的过程。法律题材有关的电影经历从对法律的涉及、再到法律领域的细分,到法律和人性之间的把握,这个过程也是法律和电影艺术在不断地平衡的过程。而我们可以对于相关法律题材电影进行分析,来看看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可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的电影,体现出来的更多是对于法律的新鲜与陌生,在传统中国人情社会下,绝大部分民众没有法律意识,所以早期的电影会集中体现出现代法治与传统习惯之间的冲突。其中张艺谋导演为代表的《秋菊打官司》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电影,本片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金鸡奖和百花奖大奖,由巩俐饰演秋菊。电影讲述丈夫被村长致残无力再干农活躺在床上,秋菊向村长讨要说法但不成功,并告到乡政府,乡政府协调村长赔偿但是态度恶劣,爱面子,不愿意道歉。怀孕的秋菊一怒之下,来到县城开始慢慢告状路,而后却又在秋菊难产的时候,村长伸以援手,两家之间和解,却在满月酒上,村长被抓走了,自此故事宣告结束。

我们可以在这里窥见法理与情理冲突,故事的发生背景是80年代的乡村,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当中,有一套准则,便是依靠乡俗乡约的约定,“面子”成为十分重要的东西,这也就是村长一直不愿意道歉,而秋菊为了挣“面子”走上告状的道路。而法律在这种“面子”“情理”之间,并不会因为乡村社会的伦理有所偏袒,我们可以想象,即使秋菊希望这场官司能够和解,但是已经在法律程序面前,并不会简单过去。同时亦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秋菊一家人在村中以后生活会面临的问题。在该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协调占据很大一部分内容,民间习惯法则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便是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同时关于其丈夫被村长伤害下体致残,是属于民法纠纷还是刑法,也是有待于分析。片中的秋菊她具有法律意识,有反抗精神,知道需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却导向一个并不是很好的结果。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乡村社会,即使是到现在,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仍然显得很明显,以秋菊为代表的故事,正是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面临从传统乡土结构到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

步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契约精神在市场上的作用愈大,愈多的人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观影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电影市场的成熟,也催生着多样化电影的需求。与此同时,法律有关的电影也在增加。其中有从国际法领域代表的《东京审判》,它讲述中国为代表的法官和检察官,在面对世界各国的法官的偏见和刁难情况下,同时又面临着对于美国法律体系的不了解,如何把侵华战犯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在刑法领域下有《盲山》《亲爱的》等电影,它们涉及拐卖妇女儿童,它们将民众视线引入臭名昭著的人口拐卖,大量家庭支离破碎,分崩离析,是社会的痛点和难点,引发社会的广泛热议。同时也促进了刑法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增加了处罚措施,并开展多项专项行动,解救一批被拐卖的儿童妇女。以这些电影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优秀与法律有关的电影,引起社会的关注,其产生的直接亦是间接影响,向广大民众普及法律知识,并且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积极向民众普及法律,在网上受到追捧,他有过

这样子的发言:“我们经常说法律要追求公平和正义,但法律不是公平和正义本身,法律一定有不完美的成分。”他说,法律要追求完美,追求公平和正义,“认识到有缺陷不代表着摆烂,而是为了让缺陷变得越来越少。”经常可以看到民众感叹韩国的《素媛》《熔炉》,因为它们直接推动韩国法律对于强奸幼女危害儿童的法律的完善,并出台预支有关的法律,称之为“熔炉法”,让大家看到艺术的力量。

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在法律、艺术、商业、伦理等几个层次达到了平衡,在民众之间引发前协调占据很大一部分内容,民间习惯法则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便是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同时关于其丈夫被村长伤害下体致残,是属于民法纠纷还是刑法,也是有待于分析。片中的秋菊她具有法律意识,有反抗精神,知道需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却导向一个并不是很好的结果。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乡村社会,即使是到现在,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仍然显得很明显,以秋菊为代表的故事,正是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面临从传统乡土结构到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

《我不是药神》片子就是聚焦于代购白血病“假药”的程勇、无力支付购买高额原制药后买“假药”白血病患者、投入巨大研发成本的生产原制药的厂商三者之间的矛盾。法律既要维护知识产权,医药公司前期投入巨额成本,倘若任由仿制药的发展,那么将打击制药公司积极性,减少对于罕见病药的研发;对于癌症患者而言,高昂的医药费用,无力承认,很大可能面临等死的地步;对于代购假药商而言初心是为了帮助患者,如果太高的惩罚,也会让民众怀疑法律过于冷酷无情。导演编剧和演员的通力合作之下,《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各层面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它让民众参与讨论情理与法理、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与拯救生命之间取得平衡、它推动国家医保改革,使得白血病患者受惠,电影本身亦获奖无数取得高昂票房。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法律有关的电影,对比之前三十年左右的发展,电影与法律之间的融合,已经触及到更深层次。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联通,文艺作品产生的作用比以往更加大,民众能够及时将反馈在互联网表达,之后不断发酵。这些法律有关的电影,张扬法律精神,向民众普法的同时,又带动大家思考,助力建设法治中国。

(作者单位:琼台师范学院)

罗杰·科曼剥削电影的反主流主题

■文/赵鹏飞

剥削电影作为一种特定的电影生产方式,独立于好莱坞大片公司体系之外,通过使用流行的、迎合观众喜好的人物、情节和主题,直接触及特定观众(主要是青少年群体)的心理期待,虽然大多数制作成本和艺术水准偏低,充斥着大量的摩托车、海滩、暴力等冒犯性元素,采用时代性或争议性的主题,但仍在票房方面获得成功。而罗杰·科曼作为电影历史上制作剥削电影最多的导演、制片人之一,自1955年开始拍摄剥削电影,导演了50余部,并参与制作了四百余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正在经历反文化运动,涌现出一系列反主流文化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包括反对战争、争取民权、探索性别和性别角色、推崇和平与爱、崇尚自由与平等等等。作为以结合时事热点话题为策略构建自身特质的剥削电影,该类主题迅速出现在剥削电影的创作中。相对于其他剥削电影导演而言,科曼对此类主题进行了较为彻底而深刻的探讨,而这种深刻的探讨较少地出现在其他剥削电影中。

一、反主流文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飞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钢铁、电器和纺织品生产国。大多数美国人沉醉于物质财富中,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刚成长到青春期的婴儿潮一代,他们反对追求物质财富和传统的生活习惯,而要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反对一切主流文化,选择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与艺术,而主流的好莱坞电影人却没有及时意识到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直到1969年,年轻的电影创作者的电影中才出现露骨的场景、粗俗的语言、暴力等反主流文化内容(1967年的《邦妮和克萊德》是唯一的例外)。罗杰·科曼是最早一批拍摄反主流文化剥削电影的导演之一,他在1966年拍摄了一部摩托车剥削电影《野帮伙》,随后又拍摄了《旅行》(1967)、《毒气》(1971年)和黑帮电影《血腥妈妈》(1970)。

《野帮伙》以法外之徒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以反主流文化为主题的叛乱故事,并使用摩托车党“地狱天使”的成员主演。电影的主角杰克·布鲁斯,他是地狱天使的领袖,开着摩托车肆无忌惮地四处奔走。电影中无论是逃离工作,打砸教堂还是狂欢派对,都在显示对主流文化的反叛。科曼曾表示:“我试图通过《野帮伙》和《旅行》来记录反主流

文化的某个方面,并尽可能真实地讲述这些故事,我既不想称赞也不想谴责。”在影片拍摄前,电影中出现的元素和倾向都已经出现在美国社会中,并且越来越明显。有趣的是,电影上映时电影主演彼得·方达(布鲁斯的扮演者)正因持有大麻而被捕受审,这也无形中模糊了角色和演员之间的界限。

二、性别权力关系

同时期,以男性为主导的电影行业中,很少由女性出演动作类电影的主角,女性演员通常扮演次要角色。科曼是20世纪50年代为数不多的会拍摄以强势的女性为主角的动作电影导演之一。他曾表示:“当时还没有人制作由女性主演的动作片。在所有的工作中,我都试图让女性真正成为的主角,并由她们展开行动”。他的一位女性同事说:“不同寻常的是,罗杰一直都是电影界女性的伟大捍卫者。”亨利·詹金斯也认为,强势的女性主角,剥削和反抗的电影故事主题,都是从科曼那里借来的。科曼制作了一系列支持女性主义的电影,这些电影的时间线覆盖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科曼剥削电影中的第一个强势女性角色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影片《五虎战西域》(1955)中。雪莉和她的叔叔共同经营一个驿站,而她的叔叔是一个酒鬼,所以雪莉负责管理车站与家庭。雪莉不仅凭借出色的枪法赢得了牛仔的尊重,同时也善于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来达到目的。随后的两部电影《沼泽女》和《俄克拉荷马女人》则更进一步表现了女性权力与男性奴化,颠覆了传统的父权制。《沼泽女》的女性主角第一次出现在银幕时穿着男性化的警察制服,并被男性角色称赞维护治安的能力和智慧。在他的电影中,科曼擅长颠倒性别属性,创造强壮而理性的男性化女性,以及脆弱、情绪化、爱幻想的女性化男性。女性无论在片酬、剧情片名等方面,都是真正的电影主角。事实上,科曼电影中强势的女性角色在电影中挥舞枪支的概念是创新的。在科曼进入电影制作行业之前,很少有女性会在银幕上使用暴力,因为传统的女性是与温柔和爱情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与力量和攻击相联系。科曼是最早公开质疑当时所接受的性别特征和性别角色的导演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个持续性地展示女性战胜男性,并熟练地应对男性工作和活动的导演。

通常意义上,剥削电影人会被强调其商业属性,电影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居于附属地位。罗杰·科曼在其创作过程中,借助剥削电影触礁、挖掘反主流文化、性别权力关系与局外人等具有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的电影主题,为剥削电影带来更多具有时代性的价值与思考。由此,也建立了区别于其他剥削电影人的特质。(作者为温州商学院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专任教师,助教)

纪录片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实践研究及其城市品牌国际化作用

■文/孙玮

随着科技和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纪录片的制作技术和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普及化,纪录片的社會影响力逐渐增强,成为了一种广受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同期,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化视野的素质培养需求,对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纪录片融入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可以生动展现社会现实、人民生活、历史文化等内容,同时又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可被广泛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政教育的多元化工具之一。同时,纪录片在跨文化交际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优势,与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目标和要求相契合,因此将纪录片与外语课程思政融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将纪录片与高校课程思政融合,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趣味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有利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品德教育。

目前,纪录片在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融合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多数研究现在从主旋律电影出发,以其完美英雄人物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目的(崔兴军,2022)。同时认为主旋律电影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自信,以宣传真

善美为核心,承载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黄洋,2023)。研究表明,主旋律电影在课程思政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为学习增加了趣味性。而相较于有着浓烈艺术色彩手法呈现的主旋律电影,以真实记录为本的纪录片,对人物、事件或现象进行真实的记录,对其意识形态的展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文化自信的加强效果会更加完善。现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纪录片在外语课程中的融合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教育价值。高校教师也已经在实际教学中开展了纪录片与外语课程思政的融合实践,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相关纪录片,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互动等等。

二、纪录片融入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索

作为一种涵盖多个领域的文化产品,各类型纪录片中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话题,可以为外语教育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外语课程思政的理

念和目标与纪录片的教育价值和社会意义相契合,外语课程思政强调人文素养、跨文化交际、全球视野等方面的教育目标,正是纪录片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产品所能够涵盖和提供的。

同时,纪录片和外语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存在互补性,纪录片作为一种情感、认知和反思的载体,可以为外语课程思政提供新的教育资源和思考方向,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因此,纪录片和外语课程思政之间具有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将纪录片与外语课程思政相融合,可以更好地实现外语教育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和社会责任感。

纪录片融入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过程中,全时段替代教学是不可取的。在此阶段,需要明确强调融入而非替代原有课程,通过与原有教学内容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学生的知识和思想,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外语能力。应该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深入理解纪录片所传递的信息和思想,同时结合现有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外语课程思政中的知识点。教师应该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结合现有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形式,例如小组讨论、个人

思考、课堂展示等,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引导学生全面了解纪录片所传递的信息和思想。同时应该重视教学效果的评价,通过教学评估工作,收集学生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和完善纪录片的教学方法和内容,确保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三、纪录片融入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实践案例

教师在纪录片的选择过程中,应以谨慎、合理、科学、专业的态度对相关话题或内容的片集进行选择。以纪录片《美丽中国》为例,该片是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荣获第30届“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大奖”最佳自然历史纪录片摄影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乐与音效奖。具有专业拍摄班底并受业界极力肯定的纪录片属于高校外语教育中纪录片选择的首要标准。在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育中,将纪录片《美丽中国》融入教学中,通过纪录片、讲座、课堂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政策,掌握中国在环保、节能、低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例如《美丽中

国》中“潮涌海岸”这一集,在课上观看后可组织学生进行长江下游的中华鲟以及江豚的相关讨论。在实践外语讲述长江中华鲟和江豚的生态现状时,让学生了解它们的数量、分布、保护情况等相关信息,引导学生认识到它们所处的环境问题,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进一步了解中华鲟和江豚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让学生了解到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价值,同时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感,引导学生思考中华鲟和江豚在长江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贡献,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从而具有人人都有责任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社会责任感。具体讨论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补充。在讨论中可以引导学生使用外语充分发表意见,鼓励学生进行思考和探讨,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辨能力。课后要求学生进行关于美丽中国的演讲或论文写作作为作业对当前环境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

四、纪录片的城市品牌国际化作用

除了在教育中的使用,纪录片可以全面、深入地展示城市的历史、文化、风景和人民生活,因此使世界各地的观众对城市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提

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形象。纪录片通过展示城市的美景、活动和产业,可以吸引国际游客和投资者。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也可以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可以把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以展示城市的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反映出城市的软实力,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纪录片可以传播城市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如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社区参与等,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的附加值,使其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认同和尊重。

将纪录片《美丽中国》融入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育中,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政策,更好地理解 and 交流中国的环保理念和价值观,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同时,传播一种观念或者价值,对公众产生影响。例如,关于环保、人权、健康等主题的纪录片可以帮助传播相关的价值观和理念,并对中国城市品牌国际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作者系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系三峡大学教学研究项目:水利水电工程法(K2021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系宜昌市2023年度社会科学课题研究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宜昌城市品牌国际化研究(ysk23kt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